

建国初刘少奇解决民生问题的探索

易振龙^{1,2} 朱妍¹

(1.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2; 2.北京师范大学珠海分校 政治与公民教育学院,广东 珠海 519085)

摘要:建国初,国家经济濒于崩溃,民生十分艰难。刘少奇作为党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围绕民生问题的解决进行了艰辛的探索。刘少奇主张在制定土地改革和资本主义工商业政策时,以保存和发展城乡个体经济,恢复和发展生产力为现实基点,建立民生改善的物质基础;采用创办合作社的办法沟通国家和农村经济联系,既维护农民权益又将其纳入社会主义发展方向之中;通过多种形式的教育和培训,致力于广大人民和干部职工文化水平的提高。刘少奇解决民生问题的探索,不仅推动了当时民生问题的解决,而且在价值指向、方法论和实践方面留给后人许多重要启示。

关键词:建国初;刘少奇;民生;探索

中图分类号:D092.71;K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359(2015)06-0088-06

民生问题是一个历久弥新的时代话题,过上美好幸福的生活是中国人民百年以来的梦想及不懈追求。近代以来,中国内忧外患,战乱频仍,致使国家贫弱、民生凋敝。随着1949年新中国成立,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开启了中国民生发展的新时代,使得根本改变中国艰难的民生状况具备了现实的可能性。但是,建国初,经济政治形势十分严峻,解决民生问题面临极大困难。一方面,国内民主革命尚有镇反、土改许多遗留问题亟待解决,抗美援朝及完成统一大业的任务也十分沉重,加之常年的战争,物资极度匮乏,经济处于崩溃边缘;另一方面,人民饱受苦难,迫切希望改善生活状况,且民生问题涉及到中国共产党数十年来的庄严承诺,必须加以解决。面对难题,刘少奇基于对人民群众与党的事业关系重要性的深刻认识,从理论和实践方面对建国之初民生问题的解决做

出了十分有益的探索。

一、建国初刘少奇的民生思想及其实践

(一)实行土地改革,建立基本民生保障

土地私有是产生封建剥削的根源,土地问题是影响中国绝大部分家庭基本生计最为重要的问题。新中国成立初期,只有解决土地问题,农民才有最基本的民生保障。

1.以人民利益为标准,制定适宜的土地政策

早在解放战争之时,刘少奇就主持了解放区的土地改革运动,取得了巨大的成绩。新中国成立以后,刘少奇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又承担了解放区土改的领导工作。

刘少奇主张新中国初期的土地改革要符合人民的利益。1950年6月,在全国政协一届二次会议上,刘少奇作了关于土地问题的专题报告,他强

收稿日期:2015-06-26

作者简介:易振龙(1982-)男,湖北巴东人,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北京师范大学珠海分校副教授;朱妍(1987-)女,湖北咸丰人,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

调要使这场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土地改革，“有领导地、有计划地、有秩序地去进行”并且“符合大多数人民的利益”^{[1]31}。由他主持制定的一系列方针政策，以人民利益为中心，对指导整个土改运动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也充分体现了他一心为民的执政理念。

在这次土改报告中，刘少奇阐述了土地改革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其中最鲜明的一个特点是保存富农经济。刘少奇指出：“在目前的形势下，在今后的土地改革中，采取保存富农经济的政策，不论在政治上和经济上就都是必要的，是比较地对于克服当前财政经济方面的困难，对于我们的国家和人民更为有利些。”^{[1]39}这里，他不仅强调了保存富农经济是客观形势的需要，而且强调了其对发展经济和解决民生的积极作用。刘少奇认为保留富农经济的政策应该长期坚持，只有到了进行农业社会主义改造之时，富农经济才没有了存在的必要。但是，“这是要在相当远的将来才能做到的”^{[1]44}。此后的事实证明，刘少奇保存富农经济的政策，减少了土地改革的现实阻力，而且尽可能使农村生产力免遭破坏，收到了预期的效果。

在建国初期土地改革中，刘少奇并不是单纯吸收以往民主革命时期的土改经验，而是根据新的历史条件，以最好最快地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恢复国民经济为目的，创造性地制定路线、方针和政策。正是在这样切实为民利民的思想引导下，经过三年的努力，土地改革的任务顺利完成。到1953年春，约三亿无地少地农民无偿分得了约七亿亩土地，农具、牲口等生产资料也分配到农民手中，每年约七百亿斤粮食的地租也得以免除。土地改革之后，农民的生产生活积极性空前高涨，从而切实改善了当时农村民生问题的困境，极大地解放了农村生产力，推动了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

2. 保护农民个体经济，激发农民生产积极性，推动农村经济发展

建国之初，刘少奇在总结苏联经验教训的基础上，从促进农村生产力发展，切实改善农民生活的高度，鼓励农民发家致富，认为要保护和稳定农民的土地个体私有制，而不要轻易变更。

刘少奇认为农村的合作互助必须建立在个体经济充分发展的基础上。对于东北出现的变工互

助这种合作农业模式，刘少奇认为这种模式建立在破产、贫苦的个体经济基础之上，虽然有高达70%的农户参加互助组，但其基础是不好的，实际是受形势所迫。由此，刘少奇得出个体经济发展之后，变工互助势必要缩小的结论。他认为，这不仅不是退步，而是进步，是将来过渡到集体农庄的有利条件，因此，应该允许农民单干。但是，变工互助和集体农庄毕竟是两个不同的阶段，刘少奇强调“要防止急性病”，“转变的早了，是不对的”。在集体农庄的形成条件上，刘少奇认为“将来加上机器工具的条件，才能够领导实行集体农庄”^{[2]399}。如果没有机器工具，即工业现代化的条件，集体农庄是巩固不了的。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证明，刘少奇提出的农业向社会主义过渡不能急于求成的思想是正确的。

针对当时农村生产力落后，农民生活困窘的现实，刘少奇主张，现在必须允许适度的剥削现象存在，不要限制富农的发展。他认为，富农生产资料相对较多，发展生产的条件较好，允许其发展没有坏处，待发展到一定程度以后再给予限制。限制的办法可以通过颁布劳动法、提高雇农待遇、增加累进税、多征公粮来实现。目前，“雇工，单干，应该放任自流……对于不让雇工、不让单干的，不能放任，对于去干涉有三匹马的，不能放任”^{[2]399}。

刘少奇的上述观点，就是要允许让一些人先富起来，逐步创造条件，建立集体农庄，最终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实现共同富裕。刘少奇的这种思想还体现在《天津讲话》和《关于土地改革问题的报告》等文献中。这些论述的基本思路与改革开放以后发展多种所有制经济，搞活经济，培育社会自我调节能力的措施有相通之处，是珍贵的思想财富。

(二) 促进工商业发展，改善劳动者生活水平

新中国建立之初，民族工商业主要以轻工业为主，包含了衣食住行方方面面，直接关系到国计民生。新中国建立以后，如何看待民族资产阶级，如何看待资本家的剥削，怎样去恢复和发展城市的资本主义工商业以推动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既是重大理论问题，也是重大的实践问题。

1. 保护发展工商业，保障人民生产生活需求

资本主义在发展生产和推动人类社会进步方面的贡献巨大，人所共知，马克思也早有论述。刘

少奇认为“今天中国资本主义是在年青时代,正是发挥它的历史作用和建立功劳的时候”,对工人阶级的好处多,利大于弊,资本主义经济可以再发展几十年。如果资本主义工商业生产积极性受到打击,会带来生产力的破坏。对于民族资本主义存在的剥削及其发展方向的认识,刘少奇阐释了他对此问题的理解。

首先,一定范围存在的剥削有其客观性和进步意义。从现实情况来看,“国家还暂时没有钱开工厂,而资本家在生产、经济上比我们有办法”^{[3]101},因此必须同他们进行合作,接受剥削现象的存在。从客观历史发展的角度看,“剥削行为不是有意识决定的,而是历史发展的必然,是整个社会制度问题,中国工人阶级还要忍受一个时期的剥削痛苦”^{[3]92}。正是在这个意义之上,刘少奇提出“今天我国资本主义的剥削不但没有罪恶,而且有功劳”。“文化大革命”时期,刘少奇“剥削有功”论受到批判,这种批判脱离了时代环境,违背了刘少奇发展生产、满足人民对生产生活资料需求的本意。

其次,促使民族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方向发展。刘少奇认为在共产党领导的中国,不能像资本主义国家对资本主义那样听之任之,而是要采取措施加以限制,不能让其放任自流。他认为:“无产阶级领导的国家,在适当的条件下监督资本家,资本家为国家服务的一种制度,要更多地、更长期地采用国家资本主义的办法。”^{[3]52}正因为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政权掌握在人民手中,不必经过流血革命,就能避免资本主义的发展前途,保证社会主义发展方向。

2.改善劳动者的劳动条件与生活水平

新中国成立后,伴随着生产规模的迅速扩大,工人的数量也大幅增加,由此带来的劳动者的权益保护问题也日益凸显。刘少奇作为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之一,不仅重视国民经济的恢复建设和发展,而且重视提高工人劳动者的生活。

刘少奇强调,对劳动者的利益的保护要用法律法规确定下来。刘少奇提出要创造公平竞争的条件,保护劳动者的利益。1950年4月,他在《庆祝五一劳动节大会上的讲话》中,要求“劳资关系也可以在国家劳动法令、集体合同及劳资协商机构中纳入正轨”。此后,国家先后发布一些指示和

法规保障工人在企业中的合法权益。

在维护劳动者权益的具体实践中,刘少奇对新时期工会理论做了可贵的探索。早在1938年2月,刘少奇在论述工会工作时就指出:“工会应该经常不断地、不怕麻烦地改善工人的生活,解决每一个工人及其家属所提出的问题,只有这样才能建立工会在工人中的信仰,才能发动工人群众更高的积极性。”^{[4]26}建国初期,对于如何发挥工会在调解劳资矛盾、维护劳动者权益方面的积极作用的问题,刘少奇在《国营工厂内部的矛盾和工会工作的基本任务》中作了详细解读。刘少奇承认在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工厂内部也存在矛盾。但是,由于剥削关系消灭了,这种矛盾“与资本家工厂中的阶级对抗完全不同,它是一种在根本上非敌对的、可以和解也应该调和的矛盾”^{[1]93}。正因为如此,人们“应该用同志的、和解的、团结的办法来处理这种矛盾和关系”^{[1]94},即矛盾要通过发展生产,提高生活水平来解决。

刘少奇从当时国情出发,一方面,注重利用和发挥民族工商业在恢复国民经济中的积极作用,提高民族资产阶级对发展生产的积极性;另一方面又着手解决发展生产中所出现的劳资矛盾,切实维护劳动者的利益,在现有的条件下努力改善和提高劳动者生活水平。总之,双管齐下,在发展经济,恢复生产的同时,注重改善民生,使得发展经济与改善民生协调推进。

(三)建立沟通国家与农民经济联系的桥梁,促进农村经济发展

建国之初,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是经济建设,迅速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改善人民生活成为最重要、最紧迫的任务。正是基于这个出发点,刘少奇花费了巨大的精力和心血,投入到在农村普遍建立和发展供销合作社的工作中。

关于供销合作社的基本任务,刘少奇认为,它是沟通国营经济和农民的纽带,在将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提供给农民的同时,将农产品集中到国家手中,并通过经济的手段将农民组织起来。

刘少奇认为,发展供销合作社的最终目的是创办生产合作社。在实现我国农业合作化中,要考虑社会经济文化水平以及群众的接受力、承受力,不能急于求成。因此,他设想,先普遍发展供销社

和互助组这种低级形式的联合,让农民修养生息几年,等他们在物质和思想上都有了充分准备之后,再效仿苏联集体农庄,建立生产合作社,从而从根本上解决农村的民生问题。

办好供销合作社,在当时有重大的现实意义。从理论上讲,供销合作社符合商品经济的客观规律,符合马克思主义的经济思想,不存在理论障碍。更为重要的是,供销合作社免除中间商人或资产阶级的剥削,保护了小生产者的利益,能够更好地同资产阶级争夺对农民的领导权,将他们团结在无产阶级的周围,是促进国民经济的一项根本措施。早在1948年12月,刘少奇在《合作社的地位和作用》中就指出“没有合作社,无产阶级就不能在经济上领导农民,不能实现无产阶级与农民的联合,这在新中国的经济建设中是一个带决定性的问题”^{[5]21}。他认为,合作社能引导农民的生产 and 消费,是过渡到社会主义的重要桥梁,“合作社是一个广大的共产主义学校”^{[5]19}，“是可以经过合作社的道路逐步前进到社会主义的”^{[5]39}。

实践证明,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供销合作社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供销合作社是连接广大城乡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的纽带。在我国广大农村,国营经济难以发挥作用的穷乡僻壤,承担着相当一部分产品价值实现的任务,其群众性和灵活性的特点,使得农民和小生产者手中多余的产品能及时卖掉,同时他们所需要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又能及时买进,极大激发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团结了广大小生产者,促进了生产力的提高,对改善当时民生状况发挥了积极作用。正如江泽民所说,刘少奇“倡导下建立的各级供销合作社组织,建国初期恢复被战争破坏的国民经济,加强城乡物资交流,保证广大农民的生产和生活资料的供应,发挥了巨大的作用”^[6]。

(四)提高人民文化水平,推进文化教育事业

教育是人才培育的基础,是振兴民族的基石,关系着全民素质的提高。建国初,人民政权“对教育主权的收回和对各类私立学校的接管,将各类教育统一到党和政府的集中统一领导之下,保证了广大劳动人民公平平等地接受教育的权利和机会”^[7],刘少奇在教育领域也进行了可贵的探索,展

现了其教育民生思想。

1.开展识字运动,逐步提高人民的识字率

新中国成立之时,全国文盲率占70%左右。提高人民的识字率,扫除文盲或半文盲,成为文化教育事业方面的首要任务。从1951年开始,全国范围大规模的识字运动开始了,各地充分发挥积极性,探索出了一些好的经验。

1952年6月,刘少奇听闻西南军区文化教员祁建华发明速成识字法并取得显著效果。为此,他致信陈云等人,指出:“速成识字法发明以后,在全国范围内大张旗鼓地推进识字运动,是一项十分重要的工作。”^{[8]154}他要求筹备专门经费予以推广。1952年9月,中央要求从上到下成立各级扫除文盲委员会,掀起了学习文化的一波高潮。刘少奇提出“应组织识字运动协会,以便吸收各种愿为识字运动服务的人参加这一工作”^{[9]21}。在全国上下共同努力之下,到1952年底,700万人摘掉了文盲的帽子。

2.满足经济建设对专门人才的需求,加强对专业技术人才和管理干部的教育培训

重视和加强职工教育。建国之初,在文化水平极度落后的总体环境之下,职工的教育水平也十分低下。一方面,这不能满足经济发展中工业化和专业化的要求;另一方面,职工作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是国家的领导阶级,没有较高的文化教育水平,不能很好地发挥当家作主的作用,不能代表先进生产力和文化的发展方向。刘少奇认为,要把职工组织起来并教育他们,使他们提高觉悟,使他们顾大局、识大体、有能力,然后才能实现其领导任务。^{[10]380}

注重提高干部素质。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长期在农村领导革命,大量工农干部原有文化水平低,且受条件限制缺乏系统培训。此外,全国解放前夕,鉴于干部缺乏,上百万人民解放军成为地方干部,文化和专业素养也急需提高。1950年5月,刘少奇在全军参谋会议上说:“部队和地方的老干部是我们党的精华,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骨干”,但是,他们“文化水平低,技术知识少,业务能力差,因而应付新的工作有困难。”^{[11]26}因此,国家准备拿出一笔教育经费,花几年的时间对他们进行系统培训。此后,中央根据这批老干部的文化情况,对

他们进行了分层次教育,文化水平极低的主要教他们识字,有一定文化水平的帮助其提高业务素质,提升理论水平。培训的课程也十分多样,从小学、初中、高中乃至大学的课程都有。这些措施提高了干部队伍的素质,加强了他们的领导水平。

二、建国初刘少奇探索民生问题的启示

民生问题既是历史的,又是具体的。建国初期,刘少奇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克服复杂的国际国内环境的制约,立足于国情,采取灵活的方针政策,为恢复和发展生产,逐步解决民生问题做出了重要贡献,其思想精华对于人们更好地解决当今的民生问题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一)在价值指向上,将解决和改善民生作为践行党的宗旨的根本途径

在解决民生问题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要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以最大多数人民利益为标尺,将不断改善和解决好民生问题作为党的基本诉求。在建国之初,面对当时严峻的民生问题,刘少奇始终对民生问题保持高度重视与关注,不让“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停留在口头上,挂在条幅上,而是积极为人民群众解决现实问题。这充分体现了党的宗旨,也展现了一代革命家一心为民的高尚风范。

建国初刘少奇民生思想根植于当时政治经济发展的需要,与毛泽东、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民生思想相呼应、相联系,其内容和精神内核既是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反映,也是丰富和发展它们的重要思想元素和实践参照。改革开放以后,党的历届领导人都以民生作为治国理政的根本导向,诸如邓小平“三个有利于”的思想,江泽民“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思想,胡锦涛“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的思想,都反映了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对人民福祉的不懈追求。在新的历史征程上,习近平以人民的梦作为中国梦的价值指向,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实施,以“三严三实”活动整顿党的作风,这正是共产党人勤政为民、着力改善民生的集中体现。

改革开放30多年以来,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经济总量已跃居世界第二位,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但是,与之伴随的各类社会矛盾也

凸显出来,改善民生仍然是核心问题。中国现阶段的一项迫切任务,是亟需建立起一个较高水平的民生保障体系。就当下国家经济实力来说,较之建国初,已经从“能不能做”转换到“想不想做”的位置。此时,继承和发扬刘少奇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改善民生、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理念,有重要价值引领作用。

(二)在方法论上,用发展的办法解决民生问题,统筹兼顾,重点攻坚

刘少奇在建国初期,面对着千疮百孔的民生困境,依然能找到重点,从解决最迫切的“吃饭问题”着手,逐一攻克,打破当时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危局,极大地推动和改善了国民经济的发展。

解决民生问题,根本处是要搞好发展工作,与此同时,协调好经济发展、社会进步、民生改善的关系。一方面,发展是前提,只有发展了才可能逐步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解决各种现存的社会现实问题;另一方面,要牢记发展是为了人民的终极目标,将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以及民生的改善协调起来,切实解决当下人民群众在诸如住房、就业、教育、医疗以及其他社会保障方面存在的困难和问题。从当前社会实际来看,就是要在经济发展和民生改善的关系处理上,将更多的精力和资源投入到民生领域,使民生保障和经济发展置于同样重要的高度,克服脱离民众基本利益诉求、片面追求经济发展速度的倾向。

中国面临的社会矛盾复杂多样,千头万绪,一时之间难以全面化解,这就要求在统筹兼顾时,重点攻坚。党的十八大提出要使全体人民“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1]。这就牢牢抓住了新时期民生问题的重点,为国家进一步改善民生提供了指导。

(三)从实践结果来看,政策的制定要符合实际,取得实效

一项政策的制定,一个方案的出台,检验其好坏的标准是实践。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和领导党,肩负人民重托,一举一动都关涉天下苍生之安危,其方针政策的制定既要合符理论之逻辑,更要注重实践之效果。历史上,我们曾经有过画地为牢的曲折经历,事实已经证明,以经典为界、以理论演绎代替复杂的社会演进不能获得成功。刘少奇

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立足实际,大胆进行理论创新,对富农经济和资本主义经济的贡献进行了肯定,对“剥削”进行了辩证的分析,展现了他极大的理论和政治勇气。建国之初,有关土地改革、资本主义工商业发展、改善民生等一系列方针政策,原则性与灵活性兼备,在实践中取得了很好的效果,提升了国家实力,增进了人民福祉。

改革开放以来,中央立足民生改善,制定了一系列符合人民利益的政策,在实践上大大推进了民生改善的深度和广度。比如,以家庭联产承包经营责任制解决了老百姓的基本生活问题;重点推动“三农”问题的解决,开展新农村建设,从2006年开始全面取消农业税,加大对教育的投入,实现了义务教育的全面普及,新世纪之交,大力推进西部大开发,采取多种途径进行扶贫。这些举措实践效果好,得到人民的大力支持和拥护。

在全面深化改革的新时期,继承党的先辈实事求是、踏实肯干的工作作风必将促进各项事业的发展。当下中国,正如习近平所言:“我们的人民热爱生活,期盼有更好的教育、更稳定的工作、更满意的收入、更可靠的社会保障、更高水平的医疗卫生服务、更舒适的居住条件、更优美的环境,期盼孩子们能成长得更好、工作得更好、生活得更好。”^[12]民生问题对于中国民众如此重要,涉及面如此广泛,已经成为中国民众最为看重的、最为普遍的利益诉求,执政党必定要展现出非凡的魄力

和智慧去努力解决之。

参考文献:

- [1] 刘少奇.刘少奇选集:下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
- [2]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第1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2005.
- [3]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刘少奇论新中国经济建设[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
- [4] 王进,蔡开松.共和国领袖大辞典刘少奇卷[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3.
- [5]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华全国供销合作社.刘少奇论合作社经济[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7.
- [6] 江泽民.在纪念刘少奇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N].北京:人民日报,1998-11-21.
- [7] 王进,皮海峰.民生视阈下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教育事业[J].湖北社会科学,2013(3).
- [8] 中共中央文献出版社.刘少奇年谱:下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
- [9]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刘少奇研究组,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刘少奇论教育[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98.
- [10]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华全国总工会.刘少奇论工人运动[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
- [11] 胡锦涛.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 [12] 习近平.在十八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同中外记者见面时的讲话[N].北京:人民日报,2012-11-15.

责任编辑 虞志坚

Liu Shao-qi's Probation into the Solution of Livelihood Issues after the Foundation of P.R.C.

YI Zhen-long^{1,2}, ZHU Yan¹

(1.School of Marxism, Wuhan University, Wuhan 430072, China;

2.School of Political and Civic Education,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Zhuhai, Zhuhai 519085, China)

Abstract: After the foundation of the P.R.C., the national economy was on the brink of collapse, and livelihood was very arduous. As one of the major leaders of CPC, Liu Shao-qi probed into these issues and proposed some suggestions. He proposed that the policies of agrarian reform and capital industry and commerce should be based on the development of individual economy of urban and rural working people and the revival and development of productivity. Meanwhile, the connection between national and rural economy could be based on the establishment of cooperatives, so as to protect the interests of farmers and keep them to the developmental direction of socialism. The cultural level of common people and workers could be improved by various education and training. Liu's probation helped to solve the livelihood issues and gives successive generations a lot of enlightenment.

Key words: in the beginning of P.R.C.; Liu Shao-qi; livelihood; probation